

农业社开展社会主义 思想教育的经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农業社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經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年 沈阳

农业社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经验

☆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1 $\frac{1}{2}$ 印张·32,000字·印数：1—6,589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7090·67 定价(5)0.14元

編 者 的 話

自从中共中央發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規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以来，各地都創造了許多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經驗。这本大辯論經驗的小冊子，就是从报刊和作者来稿中选出的一些文章汇编而成的。遺憾的是，我們还没来得及把各地，尤其是我們辽宁省有关这方面的較好的經驗，都編选进来，这样，本书的内容一定还不够全面和丰富。但是，就是这些經驗，已經生动的說明了大辯論这种形式的优越，正象刘少奇同志所說的，这是最能發动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性和责任心的一种形式，也是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因此，我們相信，这些經驗对目前，以及今后每年都要向农民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会有帮助的。

目 录

在农村中大放大鳴大爭	1
——“人民日报”社論	1
今昔相比，恍然大悟	7
——兴隆社是怎样通过算細賬的办法开展大辯論的	7
大辯論中对人对事都要具体分析	21
工作组注意發动羣众的經驗	29
通过大辯論整顿薄弱社的經驗	34
同心社开展大辯論是怎样結合生产和推动生产的	41
大广乡团組織在社会主义大辯論中的工作	45

在农村中大放大鳴大爭

“人民日報”社論

我国农村已經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但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結束。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陣地，克服資本主义的傾向，在目前有必要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規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1955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农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亿农民爭先恐后地加入了高級农業社，并且随即掀起了生产高潮，在大灾之年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亿斤。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虽然有極少数人退社，同时却有更多的人入社。这些事实無可辯駁地說明：我国农民是願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業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得到偉大的成就。

但是决不能認為农業社一成立就会巩固起来。这种想法是不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的。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中已經指出：“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是要經過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業中，要想不經過艰难曲折，不付出極大努力，总是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合作社正在經歷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相当長的时间。

在合作社逐步巩固的过程中，需要同时在經濟战綫上和政治思想战綫上进行斗争。在經濟战綫上，要不断地發展农业和农村副業的生产，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并且正确地解决分配問題，使社員的收入逐步增加。在政治和思想战綫上，要教育絕大多数社員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合作社的集体事業，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从根本上摆脱資本主义的影响，并且积极地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作斗争。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这一年多期間，各地农村工作人員对于經濟战綫一般比較重視，而在政治和思想战綫上，工作却显然落后了，許多农村工作人員和农村的党組織似乎認為，在合作化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中再沒有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了，因而放松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工作。

这种想法是完全錯誤的。他們忘記了毛澤东同志的这些教导：“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綫，在社会經濟制度發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头腦里，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經過許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勁，又可能垮台。”“富裕农民中的資本主义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們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長的时期內，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資本主义傾向就会泛濫起来。”（見“中国农村的

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严重的教训”和“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两文的按语)

事实正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止了或者削弱了的地方，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就抬起头来，大肆活动起来了。

不能忘记，农村中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还正在被改造，要使这些人从思想到行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无疑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这个改造已经收到效果。但是一部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同类的坏分子在一起，仍然在等待时机，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挑拨工农关系，扰乱社会秩序。今年6月上旬以前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期间，在一些农村里，就有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原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乘机而起，恫吓农民，殴打干部，甚至公然企图倒算。很明显，如果对于这些坏分子不给以坚决的打击，我们决不能在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

富裕中农，多数是愿意同贫农、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自愿地参加了合作社，可是许多人是“随大流”，并没有充分的自觉。实际参加了集体的生产活动和收益分配以后，他们不免感到自己多年养成的旧习惯同新制度有矛盾。农业社初办，生产和收入一般地一时还难于达到某些富裕中农原有的水平；一切新生的经济制度都会遭到的困难，如物力不足、经验不足等等，在新办的农业社里也是难免的。即使社里的生产显著地增加了，要把社里人同人之间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善，也不是

短时期容易做到的。于是，一部分富裕中农觉得在社里“受拘束”或者“吃亏了”。在处理国家、合作社、社员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少数富裕中农起了消极的作用。一小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不顾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隐瞒产量，从事商业投机，破坏统购统销，并且在合作社中散布错误言论，破坏社内团结，损害公共财物，妨碍劳动纪律，甚至鼓动社员退社。少数富裕中农在这些方面的活动，客观上助长了一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对于一般富裕中农，我们当然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巩固地团结他们。但是，如果有人坚持错误，蓄意破坏国家的利益和合作社的利益，那就必须对这极少数人展开说理斗争，把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彻底驳倒。如果不系统地讲清事实，辨明是非，伸张正气，压倒邪气，就达不到团结的目的。

大多数农村党员和干部是忠诚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他们是广大农民所拥护的领导者。可是，有一部分农村党员和干部，包括一部分县级工作人员在内，没有认清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没有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些同志在对象粮食问题这样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有极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上，错误地站到了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立场上。有些同志，对于坏分子危害农村秩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没有及时地给以应有的打击。

这些事实说明：尽管合作化运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新事物同旧事物的斗争决不是一年两年所能

够解决的，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仍然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十分必要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企图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别的坏分子的反革命行为。这是农村中的一场不可避免的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还要了解，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任务，决不是只进行这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样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每年进行一次。不然，就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彻底胜利，谈不上社会主义农业的顺利发展，谈不上合作社制度的日益巩固。

这场斗争应该怎样进行呢？已有的经验证明：最好的方式就是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农村中，包括单干户在内的全体人口中，展开群众性的大辩论，也就是在农村中实行“大放大鸣大争”。首先，把农村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都揭露出来，让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发表出来，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也就是坚决地充分地进行说理斗争，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有人认为，这种大辩论的方式，在比较高级的机关里和学校里可以采用，在农村不能采用。这是对于党的领导的力量和基本群众的智慧缺乏信任的表现。根据山西榆次、襄汾、洪赵等地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经验，在上级党委的工作组和农村基层组织共同领导下，在农村中同样可以采用大辩论的方式，而且只有采用这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解决问题。

辩论一些什么问题呢？根据目前各地农村情况看

来，有关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統購統銷、城乡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这四个方面的問題，在农民羣众和农村工作人員的思想上特別需要澄清。因此，这四个方面的問題特別需要提出來辯論。

在秋收以前，辯論應該首先集中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統購統銷問題上。这是当前羣众最关心的一个問題，也是为了順利地完成今年統購統銷任务必須首先解决的一个問題。要使每个基層干部和农民都懂得：是否百分之百地完成粮食統購任务、严格地控制粮食銷量和認真地節約粮食消費的問題，實質上也就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問題，爱国不爱国的問題。农业生产的發展和合作化，不仅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任何时候，都不允許把个人的局部的利益同国家的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目前在农村里發生的一个最尖銳的問題，正是一部分落后分子把个人利益放到了同全体人民的利益对立的地位。他們为了个人的利益，要求国家对粮食少購多銷。收購的少，銷售的多，拿什么填这个窟窿呢？拿什么去供应城市人口、工矿区人口和軍隊的粮食需要呢？拿什么去供应灾区农民、經濟作物区农民和缺粮农民的粮食需要呢？当人人都需要節約粮食来建設社会主义的时候，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怎么能够不帶头節約粮食呢？他們認為这些是国家的事，他們不管。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自私自利，还能不能建設社会主义呢？沒有社会主义的祖国，沒有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还能不能有农业的發

展和农民的幸福呢？显然是不能够的。因此，粮食问题的辩论不但对于紧接着秋收的粮食工作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树立爱国爱社爱家必须统一的思想，对于树立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思想，有决定的意义。

在别的几个问题的大辩论中，也要紧密地围绕着这个中心目的：教育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了解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一致性，懂得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必要性。

在无论什么问题，都要有充分的信心：信任党、信任群众。绝大多数农民群众同我们的党有血肉一般的联系。他们是愿意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在这次大辩论中，只要加强领导，依靠基层组织 and 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坚持用说理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坚持反革命必须肃清、坏分子必须打击的方针，一定能把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斗垮，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

今昔相比，恍然大悟

——兴隆社是怎样通过算细账的办法开展大辩论的

吕荣周

盘山县兴隆社在开展合作化大辩论中，采取了民主算账的方法，效果很好。下边就让我们从头详细介绍一下。

鸣放之前，顾虑多端

鸣放前，干部和群众的顾虑很多。经过了解，骨干存

在的思想顧慮，有以下几种：第一是有“兩頭難”的思想。一難是，鳴放會上不發言怕社員觀望；二難是，心有不滿意見不敢外放，怕組織上說沒有立場，受批判。第二是信心不足。由於在糧食辯論結束後，社員中仍有少數人沒有徹底解決思想問題，反過來就謾罵和打擊積極分子，有的骨幹就因此而消失了鬥爭的積極性，在這次合作化大辯論中，就想後退幾步，站在運動的中間或排尾。第三是不敢大膽發動羣眾鳴放。怕放出一些問題沒法解決，亂了套而影響生產。一部分工作中有缺點的骨幹，則顧慮羣眾給他提意見，所以也不敢大膽鳴放，只想跟着羣眾跑，順情說好話，工作消極被動。

在羣眾中間對鳴放的思想顧慮也很多。在地主和舊富農與部分上中農中存在着許多思想顧慮：表現在真心話當落後人說，背後說；當眾則說光溜話。心裡留戀資本主義的道路和生活，對走社會主義道路有動搖；入社後對集體勞動不習慣，情緒消極，生產中搗亂。他們還存在着“四怕”，一怕暴露出自己的反社會主義真面目，二怕說他是破壞分子，名譽不好，三怕政府鎮壓他，四怕羣眾對他看法不好，今後的活動有困難。在一般的貧中農中則存在有“三不清”的思想，一是对這次為什麼要開展合作化大辯論的意義認識不清，二是对工作中的缺點與合作化制度的優越性的關係混淆不清，三是对工作中的錯誤的責任都應由誰來負弄不清。

干羣中存在的這些不同思想顧慮，都是大鳴大放、暢所欲言的阻力。所以，我們在鳴放之前就着重研究了如

何解决这些思想顾虑的办法，給大鳴大放开辟道路。我們是怎样解决的呢？主要是对骨干和社員羣众进行啓發動員，解除顾虑，树立信心。我們对骨干的教育内容主要是，进一步使他們認識开展大鳴大放的重大意义，提高政治覺悟，消除顾虑，大胆鳴放。树立依靠羣众、相信羣众的思想与走羣众路綫的工作作風。并且采取了“集中教育与个别談話、登門訪問”的方式进行教育，效果很好。如骨干刘恒山自己說：“我未經过教育之前，真是誠心想不干了。积极斗争获得胜利是大家的，得罪人是我自己的，受碰挨罵不合适。經过教育后，我想了一下，这个思想是不对的，决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三言兩語就动搖了自己的立場。刘胡蘭为了党和人民，鋤刀压在脖子上还高呼共产党、毛主席万岁！我要坚决站稳立場，斗争到底。”又如張維寬、刘春明等人也都一致表示态度說：“我們决不能动搖，一定站稳立場，把这次运动搞到徹底胜利，解除顾虑，大胆鳴放，以提高自己。”

对羣众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反复地說明为什么开展大鳴大放，鳴放什么，为什么要开展大規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打消不正确思想認識和疑虑。教育的形式，是采取“集中（以生产队为單位）报告，地头座談，骨干随时随地宣傳”的方法进行的。經过教育后，原来不打算發言的、不打算参加會議的、不打算說心里話的以及有其他疑虑的人，态度都轉變了，由消極轉向积极。如羣众周永風說：“我的破嘴就是爱說，前一次粮食辯論說了不少，最后地主刘万春被大家批判了，这么一来我就下了决心，不

說話或少說話，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这个时期是应紧睜眼慢張口，不知道那句会說出毛病来。这回我听了报告，算懂得了，大鳴大放是叫咱們社員大家提意見，辯明是非，这我就用不着顧虑了，坚决有啥放啥，有的不能留，沒有的不能添。”又如富裕中农刘福玉前两个會議都不参加，而后不但積極参加，还在会上發了言。

經過这些工作后，就解除了干羣的思想顧虑，給大鳴大放扫除了思想障碍。

解除顧虑，暢所欲言

在解除干羣思想顧虑的基础上，确定了鳴放内容与形式。鳴放内容有三个：一是合作化好不好？二是人民生活到底提沒提高？三是要不要人民民主專政与民主集中制？其中是以第一、二两个内容为主，在羣众中开展了大鳴大放。由于当时正处在緊張的秋收，为了使参加鳴放會議的人数多，集会快，鳴的深，放的透，按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地采取“大会鳴放、地头会鳴放、小型会鳴放”三种不同形式进行鳴放。对妇女的鳴放則是采取“骨干分片包干，小会座談”的形式进行。这样做大家很滿意。如双目失明的陈老大娘說：“这可太好啦，到我們家来开会，不然我算听不着，也說不着，誰能領我去听会呀！”这样做是有利于全面鳴放、徹底鳴放的。

全面鳴放开始后，干部羣众提出很多意見。無論从鳴放广度和放出的問題性質来看，都是既全面，又复杂，归納起来，可分为兩类。第一类是否認合作化制度的优

越性。認為合作社不如單干好，地荒、地薄打糧少，依靠合作社，農民生活永遠難提高。如上中農趙樹華在鳴放會上說：“合作化沒有優越性，窮棒子入社後生活提高全靠富裕戶投進去的好車、胖馬、肥沃土地，不然他們入社，赤手空拳，連地都種不上，他們生活咋能提高呢？說依靠合作化，合作化沒給他們帶來車、馬和好地。”上中農趙守衛也說：“人民生活沒有提高，光看見羣眾吃大米飯，沒看見羣眾吃土豆；光看見現在羣眾穿幾件新衣服，沒看見過去羣眾有衣服攢着不穿；光看見現在羣眾買有數的布穿，沒看見過去家里存着穿不了的布疋。現在誰家都有啥？也就是‘老母猪去趕集，家里家外一件皮’。過去當老人的，誰不打算攢錢給兒孫后代打點江山呢？誰有錢舍得這樣花呢？現在這個國家有錢沒處用，只好是吃點、穿點。”富裕中農劉富玉說：“入合作社是老太太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地只能薄不能厚，只能荒不能淨，只能少不能多，產量只能低不能高，入社頭一年庄稼長的好，那是全靠單干時候的糞底，不信再種二年，別說長庄稼，就是黃葉菜也不能長了。我過去是家中院有陳柴，園有餘糧，牲口、人都自由，生活還好。現在可倒好，苦幹一年還吃不飽，這樣要說是生活提高，就得叫老百姓拿土豆當面包。”總之，這部分人的思想認識是由他們的經濟地位決定的，是站在反動的立場上，存心反對合作化，否認合作化的優越性。他們共放出13條反社會主義的謬論，污蔑合作化制度，抹殺成績，誇大缺點。並且給合作化下了個“十大缺點，兩大優越”的結論。這就明顯的暴露出他

們反对合作化的真面目了。

另一类是羣众提出的善意批評及合理化建議，主要是反映在經營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如刘恩志(下中农)在鳴放会上提出：“合作社有剝削，比过去还厉害，現在沒掉肚臍子的小孩下地也掙10分，我們这过去扛大活打头的手也是10分，这样搞我明年坚决退社。”吳永久(貧农)提出：“合作社的領導干部对牲口飼养上不关心，不聞不問，下边飼养員就一天一天的往前混，結果是把啞巴牲畜餓的眼睛溜圓，身上瘦的象刀楞子一样，合作社留的料也不算少，可是把牲口給餵的很瘦，就是沒人关心社的财产，都坏了良心啦。”張殿学(中农)說：“合作社的脫产干部是干打雷不下雨，工作有布置沒檢查，不能与社員同甘共苦，参加生产領導生产。包工包产之后，把任务往生产队一推就算完，不睜不看，下边乱套也不管，那能搞好生产，办好合作社！”这些基本羣众的批評意見，都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办好合作社，搞好生产。他們在大鳴大放中積極提出有关經營管理方面的意見17項，干部作風問題6項，共23項，并誠懇全面地給合作化總結了12条优越性：(1)旱田变水田，荒地变粮倉；(2)沒有合作化使用不起抽水机器，征服不了自然；(3)人多心齐力量大，大灾大难都不怕，能够战胜洪水，能够消灭灾害；(4)从前無人撫养的五保戶，合作化以后有了依靠，生有人养，死有人葬，过着幸福的生活；(5)农村再不能出現地主、富农剝削扛大活的不合理現象了，共同走上富裕道路，永远摆脱了貧困；(6)房無一間地無一壠的貧穷农民，合作化后盖上了新房子；(7)